

陈梦雷与杨文言交游考

张晓红, 高文晴

(集美大学 海洋文化与法律学院, 福建 厦门 361021)

[摘要] 陈梦雷是清代著名学者, 是《古今图书集成》的编纂者, 他的一生因“三藩之乱”而浮沉: 被贬沈阳17年, 赦免回京后担任康熙帝三子允祉侍从19年, 雍正即位后再贬黑龙江卜魁。他一生中交往时间最长、感情最深挚的朋友是杨文言。他们相识相知于耿精忠叛乱闽中时期; 乱后, 杨文言帮陈梦雷脱困; 陈梦雷贬谪沈阳时期, 他们书信往来, 互相勉励; 陈梦雷担任允祉侍从后, 举荐杨文言入幕, 与其联璧共纂书籍。他们患难与共, 互促互助, 谱写了一曲可歌可泣的友情之歌。

[关键词] 陈梦雷; 杨文言; 李光地; 交游考

[中图分类号] I 206.2; G 25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889X (2023) 04-0068-08

一、引言

陈梦雷(1651—1740?), 清初著名学者、诗人、文献学家, 一生经历极为坎坷, 交游颇为广泛。目前学界对其个人生平重要事迹有粗线条的勾勒, 但对其交游尚缺乏必要的梳理。杨文言为清代比较有名的学者, 然而对他的研究却很少。据笔者考查, 陈氏弱冠中进士, 结交座师丁蕙及同年李光地、王揆、徐乾学、德格勒等, 壮岁遭遇耿精忠叛乱, 被迫投降, 乱平后被贬谪沈阳17年, 期间, 因才学为当地官员如奉天府尹高尔位、董秉忠、盛京将军绰克都等所看重而被聘为幕僚; 因设馆授徒, 与地方世族如铁氏家族颇多交往。此外, 还与游历此地的士人如黄鸢来、孙眉光、方外之人心月上人等多有交游。被赦免回京后, 又与顾八代、方世举等交游。然而, 在其一生中, 交游时间最长、感情最为深挚的人是杨文言。陈梦雷与杨文言年龄相仿, 虽然志向不同, 但皆酷爱读书、学问渊博, 在耿乱中均有被迫投降的经历。杨文言也是李光地和陈梦雷在耿乱中盟约的唯一见证者。考查二人的交游, 对厘清陈梦雷的生平事迹与思想、陈梦雷与李光地的关系以及杨文言的生平事迹, 都有比较

重要的意义。因此, 本研究拟以二人文集及相关文献为据, 对其交游做较为详细的梳理。

杨文言(1651?—1711), 字道声, 号南兰, 江苏武进(今属常州)人。其父杨瑀(字雪臣), 志行高洁。顾炎武赞其有“探赜洞微”之长, 而“不刻文字, 不与时名”“不为声利所迷而不悟”, 且教其子“博探文籍而不赴科场”^[1]。文言少时与兄昌言同负文名, 后则特意留心兵、农、河渠、历算、礼乐等经世致用之学, 尤长于天文历算。撰有《南兰纪事诗钞》九卷(今存两卷)、《图卦阐义》(佚)、《易俟》(佚)、《历象图说》《历象本要》等^[2]。

二、耿乱之际: 危难中建立的生死之交

陈梦雷与杨文言的交游始于康熙十三年(1674)。陈梦雷于康熙九年(1670)中进士, 选庶吉士, 散馆后得授翰林院编修。陈为家中长子, 下有梦熊、梦鹏二弟。陈弱冠举进士, 承载了全家的希望。其父为支持儿子在京发展, 于康熙十年(1671)携陈母及未婚妻李氏至北京生活。由于陈母难以适应北京的风土气候, 陈于康熙十二年(1673)秋请假奉送父母归乡。孰料

[收稿日期] 2022-08-16

[基金项目] 高校古委会项目“陈梦雷诗文集校笺”(1611)

[作者简介] 张晓红(1971—), 女, 甘肃通渭人, 教授, 博士, 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与文献研究。

次年三月十五日, 耿精忠响应吴三桂叛乱, 据闽而反, 四处网罗人才, 陈不幸被列其中。在“父母被拘, 脱逃无路”^{[3]240}的情况下, 陈被迫投降, 被授以“户曹”之官^{[3]388[4]}。为耿精忠做事非其所愿, 然不答应又面临杀身之祸, 不得已, 陈遂假托有疴疾而养病于乌石山寺院, 拖延敷衍, 直至康熙十五年(1676)秋耿精忠投降。康熙十二年(1673), 杨文言因家境贫寒, 不得不“饥趋走他乡”(《谢当事某公》)^{[5]2}以谋生, 经人介绍, 辗转来到福州, 被耿精忠聘为上客。耿氏叛乱后, 杨文言亦被迫任耿精忠之职(大学士^①或天文生^[6])。杨文言深知耿氏不能成事, 遂私下与敷衍耿氏的陈梦雷交好, 二人在危难之中结为挚友。此阶段二人的交往主要有3件事:

1. 杨文言营救了危难中的陈梦雷。陈梦雷在《杨道声诗序》中说:“吾友杨道声先生, 早抱经济, 冥鸿高举, 乃不幸为奸人罗致, 幸而深识逆顺, 矫然自拔, 力拯余于白刃之下, 誓订同心, 坚图反正, 散其望风纳款之徒, 离其唇齿辅车之党, 卒之天日重光。”^{[3]356}可知在陈面临困境、为耿精忠所迫而几遭不测之时, 是杨文言用力营救, 方得去耿氏之疑而免除一死。杨之于陈, 有救命之恩。患难见真情, 这是二人成为挚友的关键。据《原皇清敕封孺人先室李氏行述》, 陈梦雷自言其于“癸丑除夜抵家”^{[3]495}, 即回到福州家中的具体时间是康熙十二年(1673)除夕。耿精忠叛乱在次年三月十五日, 杨救陈当在耿乱后数日之内。疑二人在耿叛乱前已有谋面, 方有危急时刻的营救之举。

2. 杨文言参与并见证了陈梦雷与李光地的共谋与盟约。由于杨的营救, 陈、杨成了金兰之友。二人处境相同, 政治上对耿氏之反叛均不看好, 认为必须另谋出路, 故“誓订同心, 坚图反正”^{[3]356}, 策略是通过散播流言来离间耿氏集团。当年五月初, 李光地亦被迫来福州, 在陈父的建议下, 二人商议如何共同报国保身。商量的结果是: 陈在福州结杨文言以“从中离散逆党, 探听虚实”, 而李则当迅速返回泉州, 伺机“从山路通信军前”, 事成之后则互白对方之功。为

了取信于李光地, 陈梦雷约请杨文言一起合议, 临别时, 陈、李二人还盟誓互保。此事在陈氏《与李厚庵绝交书》《皇清原敕封征仕郎翰林院庶吉士乡饮大宾七十四寿斌侯二府君行状》《抵奉天与徐健庵书》《四十四年五月疏》等多篇文章中都有提及。如《与李厚庵绝交书》说:

年兄犹以为落落难合。及不孝引杨道声与年兄抵足一夕, 年兄既深服其才, 且见其胜国衣冠之遗, 犹有不屑与贼共事之意, 始信前言。不孝于是定计: 不孝身在虎穴, 当结杨道声以溃其腹心, 离耿继美以隳其羽翼, 阴合死士以待不时之应; 年兄遁迹深山, 间道通信, 历陈贼势之空虚, 与不孝报称之实迹, 庶几稍慰至尊南顾之忧。年兄犹虑既行之后, 逆贼有意外之诛求, 欲受一广文以归。不孝谓不得一洁身事外之人, 军前不足以取信。若后有征召, 当坚以病辞。万一贼疑怒, 至发兵拘捕, 吾宁扶病而出, 以全家八口为保, 年兄始慨任其事。临行之日, 不孝诀曰:“他日幸见天日, 我之功成, 则白尔之节; 尔之节显, 则述我之功。倘时命相左, 郁郁抱恨以终, 死者当笔之于书, 使天下后世知国家养士三十余年, 海滨万里外犹有一二孤臣, 死且不朽。”^{[3]383}

这一计谋在当时的确不失为最好的保全之策。正如邓之诚先生所言:“大约两人皆热宦, 当事变时, 即知皇上神武, 天道助顺, 恐不可信。两人皆观望, 且自视甚高, 不肯轻于从逆, 受不重不轻之官。熟权利害, 乃定一去一留之计。”^[7]从后来杨一直协调陈与李之关系, 且与陈、李皆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来看, 杨确实参与并见证了陈、李在耿乱中的共谋与盟约, 而且是唯一的见证人。因此, 他也成为乱后能为陈洗刷罪名的最重要的证人之一, 直至康熙四十四年(1705)五月陈想上疏弹劾李光地为自己辩白时, 还说:“至臣当年劝回李光地之事, 现有李光地亲笔赠诗可据, 有江南布衣杨文言可问。”(《四十四年五月疏》)^{[3]242}

陈、杨交游之始, 最早不过康熙十三年(1674)正月。短短数月的交往, 在商议如此重大事宜之时, 陈即以杨为证人, 且欲以其做内

① 《世宗宪皇帝上谕内阁》卷二有“杨文言乃耿逆伪相”之说, 邓之诚以为“杨文言或为耿精忠之大学士”, 然“知其无成, 不受委任”。杨氏之任职不确。(邓之诚. 清诗纪事初编: 卷四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2: 434.)

应,足见二人情志之相投。从此,二人成为生死之交。这种情谊从后来陈、杨二人的诗文和行动都可得到印证。

3. 共同探讨学问。陈、杨之深交,源于性命攸关的特殊事件,但能长期持续,则在于其志同道合。二人都属于好学博识、志在建树之人,又各有所长,可以互相学习,取长补短。陈自幼聪颖,弱冠即举进士,学问、文采优长,极嗜读书,经史子集无所不观,即便是在狱中,也手不释卷,最终编纂了《古今图书集成》。杨则有所不同,据其诗“十三学诗赋,呕心古锦囊。十五弃雕虫,六艺恣翱翔。天官本圣典,悠缪排机祥。指掌披舆图,所志在匡襄”^[5]。可知其开始用力最勤的也是诗赋,但不久后便将学习兴趣转向了经学,而且重点是天文和历法。从陈后来在贬谪地沈阳写作《周易浅述》时附录了杨氏的《河图洛书》³⁰图看,二人关于易的探讨应当始于此阶段。

三、耿乱之后:困境中的倾力援助

康熙十四年(1675)十月,康亲王杰书率军入闽,耿精忠投降。耿乱期间,陈梦雷多次向朝廷投蜡书而失败,“空怀图报之诚,终无实效可见”(《康熙十五年上康亲王启》)^{[3]247},故以胁从投降而处罚;而李光地则因成功进呈蜡丸书而升内阁学士。陈期望李能遵守当初盟约的承诺,上书证明自己为伪降且有功,而李光地却因故一再拖延。康熙十七年(1678)春陈独自进京,无果而返。不久闻知京察降调之命,而李恰值丁父忧,无奈,陈遂于康熙十八年(1679)冬再次进京寻求自白的机会。此番进京,陈约请杨文言同行。陈诗《同杨道声入都题汴梁旅店》有“喜遂京华约,初从宛洛期”^{[8]66}语,可知二人相约进京,在开封相遇。此诗自注作于“庚申孟春”,即康熙十九年(1680)正月。《闲止书堂集钞》本题作《庚申上元同杨道声题汴梁旅店》^[9],诗中也有“令节依村店”句,说明二人相见的时间是当年正月十五日。二月初,同行至清风店遇雪,还分韵赋诗。陈集有《庚申春仲清风店阻雪同杨道声分韵》^{[8]93}诗,其中“汉节当年心共苦”句追忆了耿乱期间二人忠于朝廷却不得不伪降的良苦用心。

杨作所存甚少,和作已佚,但在其写给万斯同的《与明州万子话旧感述》诗当为对此事的追忆:“今日复相见,颇忆昔年否?我有骨肉交,异姓胶漆投。遭逢成市虎,梁狱收枚邹。彷徨策驽马,栖栖京洛郊。”从末句看,其所追忆之事与陈“喜遂京华约,初从宛洛期”相同,均为相约赴京之事。杨直言陈为其“骨肉交”“胶漆投”,二人关系可见一斑。

此番二人相约进京,当为陈主动相约。当时形势,因耿精忠手下徐宏弼告陈曾任耿氏枢密院学士兼户部侍郎,康熙令部议,以为其“身为侍从,率先倡乱”,拟加惩处。部议以其久不来京而革职,福建巡抚吴兴祚为其上疏补题也获咎,降五级^{[10]214}。在此情形之下,陈入京是为了寻求机会辩白,约杨文言进京,显然是为其作证的。杨帮助陈的详情虽然不得而知,但是四处寻找关系,在朋友中说明实情,应是主要方面。杨乃一介布衣,贫穷且年轻,加上其自己曾为耿精忠高级幕僚的历史使得他很难直接为陈帮上大忙,但是在陈梦雷由死刑转为流刑的过程中,他作为陈、李“证人”的角色无疑也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从营救中起主要作用的李光地和徐乾学在此后都争相延请杨文言可推知。他们对杨文言都极为赏识,在康熙问询时,李光地说杨品行高洁,乃“杜门高蹈,李颺之流”^[6]。

此阶段,他们也参与了一些聚会唱和活动。康熙十九年(1680)七月,他们与德恒一、赵过千一起去京城南郊的九莲寺避暑,有分韵赋诗活动,陈诗《庚申初秋同杨道声德恒一赵过千避暑九莲寺分韵》^{[8]66}五律五首便是此行之作。九月陈被捕入狱后,亲朋好友仍去狱中探望。从次年九月陈诗《关西墨客以扇头黄、紫二菊呈郑雪卢先生,余既为咏诗,而朱起予重赓前韵。杨友道声继至,复新郢唱。笔墨既多,风味各见,增余感慨,为足一律》^{[8]97}来看,杨道声与同乡郑雪卢等人常去探望陈梦雷,且有酬唱。

四、贬谪沈阳:书信往来,互相勉励

康熙二十一年(1682)春,陈被流放奉天,杨文言送别朋友之后即返乡。在陈流放沈阳的

17年间(1682—1698),杨亦未能安居,为生计四处辗转,二人未能谋面。尽管天各一方,却仍然有书信往来。从陈《答杨道声书》^{[3]398}可知,陈至少给杨写过2次信。首次在康熙二十三年(1684),当时杨的同乡西雷和尚云游至沈阳,陈为了给亡父作法事而请其主持,遂得相识。当西雷返回时,陈即托书给杨。此书陈集未载,内容不详。由于通信不便,陈一年多都没有收到回信,心中十分挂念。康熙二十五年(1686)春夏间,陈弟乘商船自福建至沈阳,途径常州,由于“舟夜过毗陵(即常州),未及一叩”,也没有得到杨的讯息。至十月,却意外得到了杨的信,陈欣喜异常,感觉“如晤故人”。但当看到信中杨“叹老忧贫,离惊别绪,凄清欲绝”,觉其“豪爽风流”减退,倍感痛惜。陈认为杨个人“受困食贫”尚可,而“高堂白发”在上,当有所作为,“古人志谋菽水,不惮负米行佣。被褐怀珠,据图扼吭,智者不为,而风雨衡门,饫乏甘旨,仁者不忍”,怎能只一味求取自己风骨之峻呢?陈自己被贬谪,尚且能够设馆授徒以谋生,而杨氏“生长文物大邦,竟尔钟期寂寂”,不禁黯然神伤。陈复信劝说对方说当今“圣天子勤政爱民,简擢循良,搜扬岩穴。倘有荐剡上闻,幸发悲悯之心,无作小山丛桂之恋”,认为康熙帝勤政爱民,选拔良臣,四处发掘人才,如果有机会,应当积极入世,有所作为,不要隐居避世。因为在陈看来,“天时人事,方将昌泰万年”,杨乃难得的经邦济世之人才,当把握机会,择机而作,不当默默乡居,“作野人光宠而已”。当时通信非常不易,杨的书信是托一位押送流人的八旗武职人员送来的,因为时间紧急,此人送达后“立索回书为信”。可见在当时通讯极为不便的情况下,他们仍尽力设法以书信通消息,表达对朋友的牵挂。陈虽遭贬谪,但生活基本无忧,所以鼓励朋友努力作为,并为之出谋划策。

陈梦雷在沈阳主要以教书为生,康熙三十三年(1694),在其弟子去北京参加进士考试的一段闲暇时间里,他整理了《周易浅述》一书,书后附载了杨道声的《河洛图说》。《四库全书》收录《周易浅述》,四库馆臣对此书有较高的评价,认为其“持论多切于人事,无一切言心言天、支离

幻冥之习;其论理虽多尊朱子,而不取其卦变之说;取象虽兼采来氏(来知德),而不取其错综之论,亦颇能扫除辘轳”,但是对杨氏图评价很低,认为“穿凿烦碎,实与梦雷书不相比附”^[11]。从陈将杨书带至沈阳判断,陈对杨书颇为推崇,且大有受益,故十余年后自己别有心得而著书立说之时,仍然不掠人之美,附之于后。在《洛书图说》一篇中还首先大段引述了杨氏《洛书别论》的观点,以为杨说“合前人之论,而总括之如此,其说已极明备”^{[3]283},然后在此基础上加以补充论说,可见陈对杨学问的推重。

五、赦免回京:联袂京师,共事王府

康熙三十七(1698)冬,陈梦雷因在康熙前往盛京谒陵时进献《圣德神功恭纪》诗而得到康熙帝的谅解,被赦回京,次年夏即担任皇三子允祉之师。这一阶段二人的交往表现为三方面:

(一) 陈梦雷推荐杨文言入幕允祉府,联袂纂修图书

陈担任允祉侍从不久,允祉便向他咨询有关律吕方面的知识,他自觉学力不足,便推荐了杨文言。当听说杨已回乡,便立即托人捎信,“相约入都,共相讲论”^{[3]407-408}。陈《宝像寺大悲坛感应碑文》后附杨道声评语说:

向与省斋相别久,西公不远六千里携书见示。年来予亦感于灵应,同人顶礼,西公邀过其院,属以事未果。已而西公北行来,索手书携去。今秋入都晤省斋,而西公已示寂^{[3]428}。

可见此次捎信之人仍是西公和尚。前面的“六千里携书”即康熙二十五年(1686)从沈阳带来的信,后面“北行来,索手书携去”即陈所言“相约入都”事,可见杨的回信也经由西公带给了陈。由于他事耽搁,杨于康熙四十一年(1702)秋方到京,时西公已于前一年十二月卒于京师之灵佑庵(《西公和尚塔铭》)^{[3]506}。

时隔20年,二人再次聚首于陈的半圃斋,感慨万千。杨道声在《松鹤山房文集·序》中描述说:“省斋先生向脱西曹,单车就道,吾两人判袂都门,俱壮岁。二十年后,复聚首长安,顾我贫病衰老,几不可复识,而先生亦修髯玉立,颇不

似当日尙羸纤弱之状。握手凝睇,既悲且慰。坐我半園斋中,抚今感昔。”^{[3]8}其《京邸感旧示省斋太史》诗当作于此时。追怀往事,想当年二人同心,秉持忠孝,志在建功:“纷纷斥鷃多,齷齪难为侶。丈夫各有志,努力予与汝。抗怀千载上,二胥独心许。忠孝秉大节,覆楚还复楚。却笑豫让俦,漆身徒首鼠。”如今见朋友身托王室,对其境遇感到欣慰:“花好媚阳春,莠萝附松柏。托根良有分,千载保贞白。”^[5]

此时陈梦雷虽为布衣,但以帝子之师而位重。杨文言则四处奔波,衣食堪忧。陈看到朋友穷困潦倒,“鹿鹿曳裾,寄食于诸公卿大人,无一真赏心者,发种种矣”时,遂“极言之于朱邸”(《陈东启数学举要序》)^{[3]356},杨果以其律吕之学为允祉所倚重,被延入幕,待遇优厚。陈深感欣慰,以为“见重梁园,虽终老布衣,而志业亦伟矣”(《杨道声诗序》)^{[4]364-365}。陈对杨极力引荐,除了报答其救己之情之外,也有为允祉笼络人才之意,但他更看重的是杨的满腹才学,希望他能有用武之地,有所建树。

杨于康熙四十四年(1705)进入允祉府^{[12]434},于康熙五十年(1711)去世,期间除曾短期回乡之外,长期在诚王府。其生活工作情形,从去世后陈所作3篇祭文可见一斑。如“兰坂曳裾,桐阴左席。钟吕谐声,晷仪探曷。二酉穷搜,百家综核。异膳特颁,殊珍络绎”(《代诸护卫祭杨道声文》)^{[3]491},“合璧平台,问道畴咨。虚席促膝,绮服珍庖。优崇孰匹,穷探图范,精研钟律,周髀青鸟,源搜委悉”(《又代诸护卫祭杨道声文》)^{[3]492},“综六术以析微兮,翻二酉以披寻。岁月积而三雍将献兮,庆韶護之自今”(《全李铭原祭杨道声文》)^{[3]493}。可知二人各以其擅长之学问服务于皇三子允祉,生活优游。在此期间,陈编辑了《汇编》,即《古今图书集成》的初稿,1716年上呈康熙后赐名“古今图书集成”,并成立古今图书集成馆进行再次编纂,杨则主要从事律吕、历法等书籍的编纂工作,与梅文鼎等编订了《律历渊源》。

在京期间,二人也共同参与了一些活动,如康熙四十九年(1710)二月允祉生日之时,二人联合上启为之祝寿。启文由陈主笔,在颂扬允祉之后,表达了他们的感恩戴德及忠心效劳之情:

“某等分侪皂莢,材均樗栎。昔日同遭羈困,常恨见天无期。詎意偕脱网罗,竟喜瞻云有路。敢谓邹枚之并进,庶几管鲍之同心。袜线何长,芹曝思献。驽骀共依皂枥,愿效骖服之齐驱;瓦缶联厕宫悬,私拟埙篪之叶奏。”(《同杨道声恭祝诚亲王千秋启》)^{[3]252}追忆二人同遭耿乱,幸而入诚亲王府,如汉梁王幕府之邹阳、枚乘,比肩同心;似春秋管仲、鲍叔之谊,关系至密。

(二) 诗文共赏,往来酬唱

陈、杨的交游还表现在诗文共赏与互相酬唱上。如陈60岁诞辰时,杨以四律相赠,陈感动之下,依韵奉答以谢。陈诗文中与自己生日有关的写作只有2次:一次是在沈阳,因黄鸢来祝寿而作;另一次便是此次酬谢杨文言之祝。杨作今已不存,陈四诗皆在。其诗后两首主要表现陈当时“承恩赐地郭西门”“别向蒹葭构一庐”的惬意生活。对二人来说,担任允祉侍从是他们生平最为惬意的岁月,感恩之情也是发自肺腑。而前两首则对二人的共同经历和友谊有所回顾,表现了他们的“素心胶漆”之情,也表达了共同归隐的愿望和当下作为允祉侍从的自豪之情,兹录于此以观:

浪煊长鲸动海隈,素心胶漆此时投。幸酬本愿宁称枉,长恸终天不写愁。推轂尚违禽息志,曳裾喜逐马卿游。商山芝好同归去,莫学苏生叹敝裘。(《杨道声赠余六十初度四律依韵奉答》其一)

风雨匡床午夜联,歇龕灯火忆当年。尔时共擘闽南荔,此日同看太液莲。倾险人心多反复,升沉天道有回还。望衡对宇知何日,梁苑风流继昔贤。(其二)^{[8]124}

夜雨对床,追忆往事,谈论现实,感慨人心叵测,庆幸入侍诚王府。但陈梦雷始终想有所建树,以著书立言为重,故有“大业千秋吾辈事,遭逢荣辱未须论”(其三)^{[8]125}之说,也是对朋友的激励。

在京期间,二人诗文切磋也很频繁,这从《松鹤山房诗集》《松鹤山房文集》多处杨氏评语可见。如评《落花诗》曰:“三十首有比有兴,有章法次第,皆为自家写照。吾欲以骈体序之,惜忽忽未能也。”^{[8]125}认为陈落花诗为佳作,欲以其擅长之骈体文为之序,可惜匆忙未得。评

《前汉总论》说:“全以识力卷舒,是宇宙间大关系文字。而华厚典核,亦融洽孟坚、蔚宗而成。此等作,自应独峙千古。”^{[3]268}评《晋纪总论》云:“责东晋君臣,皆堂堂正正之论,千载君臣皆不可不知。特举刘翔微显阐幽,尤不可少。安石一问,东山亦难自解。通篇皆以叙事为议论,典核复饶风致,真神品也。却开后人无数法门。”^{[3]272}对其文章的思想观点、写法都极为推许,评价极高。杨文言集《南兰纪事诗》卷首“删定姓名”中有“省斋陈氏”^[13],可见陈对杨诗也是有所阅读和评定的。

在京期间,二人还互相为对方诗文集写了序。1702年,二人久别重逢不久,杨读陈所作“古文辞若干卷”,包括“疏、启、策、论、序、记、箴、铭、骚、赋”等,予以高度评价,以为其文“体例该备,而行文如江河浩瀚,一碧万顷,何气之雄也!根柢经史,条贯百家,上下四千年,成毁利钝,如视诸掌,每决一策,皆可起而行,何其识之坚也!综核名理,研穷品汇,细之入无隙,大之弥六合,又何心之精也”,不但气雄、识坚、心精,而且还“可以考镜其行事,想见其生平”,有助于知人论世^{[3]8}。陈为杨作序则在10年之后。杨一度离开允祉府,“从容归里,与一二高人逸士唱和,集成卷轴”,故为之序。文章的重点不在评析诗文,而在谈论德业。他说杨此时荣归故里,“得终老丘园,亦可无憾矣”,但人生在世,“穷达有命,而志节求无愧于天地神明。惟一念蹉跌,则虽兔窟善营,身登荣显,而回念酬昔,泯然面赤”。假使杨当年耿乱中识见不明,哪有今日之荣光,只能“缩颈里巷,避人不暇,即强颜与里中一二名宿唱和,联篇累牍,亦不过为蒲山公‘玉露金风’之句增悲感耳”。因此,他坚持认为杨满腹才学,当经世致用,否则非常可惜:“独是锦绣其胸,不以之鼓吹休明;匡济其才,不以之经纶廊庙,徒为圣世巢由,兴廉立懦于万一焉,吾固不为道声惜,而深为世道惜也。”^{[3]356}杨文言离京、再入京时间不详,然自其去世后陈所作祭文来看,去世前他已再入允祉幕府,可惜好景不长即辞世。对老友之去世,陈梦雷异常悲痛,代替允祉的护卫以及同乡李铭原连做3篇祭文,表达了极为沉痛的哀思。在祭文中称二人之交为“结契断金”^{[3]491}、“金兰协订”^{[3]492}。

(三) 杨文言协调李光地与陈梦雷之关系

陈梦雷与李光地的恩怨源于耿乱中二人相约脱困,而李在上康熙帝蜡丸疏上没有署陈的名字,此后援救也是一拖再拖,而且还有意阻拦,所谓“留其呈词,不令投致;巧延家人,三月不遣”“恐同人别为介绍,贻书巧说,阻其先容”。加之陈陆续从友人处闻知李对自己“阴行诽谤”,甚至蓄意陷害,如康熙十八年(1679)在泉州,自都统吴申及内阁觉道弘处得知李言陈“人都托足无门,至为师友所厌,皆劝令南归”;次年入狱后,又得知李曾给冯溥说“陈某十七年入都,为耿逆探听消息”^{[3]385}等,渐觉其用心险恶。种种情绪累积,使其在贬谪沈阳后就写了轰动一时的《与李厚庵绝交书》,表达他对李的不满和内心的愤恨,旨在逼迫李光地再次上疏营救自己。康熙二十六年(1687),此书经徐乾学上呈康熙帝后影响扩大,致使李光地一时不能安于位,请假回乡,二人关系也更为恶化。陈最终通过自己的努力被赦免回京、担任皇三子允祉之侍从。陈返京之时,李光地由工部左侍郎、右副都御史迁直隶巡抚,权高位重。此后在治理河道中更是表现卓著,深受康熙帝的好评,属于“居官最优”^[14]者之一,康熙四十四年(1705)十一月,拜文渊阁大学士,到达其人生巅峰。陈回京,李自然有所防范,故陈内心虽恨而举动却不敢让李起疑心。二人的微妙心理,从陈《与黄石侯书》^{[3]407-408}可见。信中先说陈约请杨文言入都的原因是“实缘旧岁朱邸以律吕之学下询,仆茫无以应,因举杨先生以对。适闻杨先生已归里,故相约入都,共相讲论”,还说“亦恐安溪怀疑,杨先生已邮函保阳致意矣”。“保阳”即保定府治所,此借指直隶巡抚李光地。也就是说他担心李起疑心,杨特意去信解释。但是李还是不放心,就让黄石侯去陈家探听消息、侦查情况。黄住陈家数月离去,后又复来,且“变幻其辞,闪烁其迹”,这让陈非常生气,所以就写了这封信斥责驱赶黄氏。陈对李的信息则主要来自杨道声。信中谈到:“兰陵杨道声先生者,天外冥鸿,云中白鹤。适莫两忘,恩怨不任,道义相赏,可永千秋。安溪羁縻署中,彼即竭力忠告,成效彰彰。仆与相隔二十年而彼此可以相信,都不烦要结之私、侦探之诡也。……夫足下可自仆而往,则杨先生亦可自安溪而来。杨先生之来,

不烦侦探;足下之往,亦不妨实告,安用此诡譎乎?”可知杨与李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陈贬谪沈阳时,杨曾入幕李府,对弥合李、陈关系发挥了重要作用。陈回京后,杨往来陈、李二处,互通消息,也起到了很好的沟通作用。李光地《榕村续语录》所载一事亦可证:

后来陈则震自关东[曰](回),杨道声劝他不要闹,他说:“我在铁岭,皇上教进账房,屏左右,曰:‘你屡次告李某,你今日在我前,有甚么话一总奏来。’我因说他欺君卖友事,上曰:‘还有甚么话?’我又说他如何害我。如此两三番,上作色曰:‘你是个罪人,如何见得我?你今日有话不说,自此后终无见我之日矣。’我因说:‘皇上要奴才说甚么话?’上曰:‘就是李某的话。’我说:‘李某负奴才千般万般,要说他负皇上,却没有。奴才怎敢妄说?’上色即和,仰屋,以舌抵齿,作啧啧声,已曰:‘汝出去罢,我亦未尝不为他。’”杨道声又云:“他要迫得老先生自认一个欺君负友之罪,向皇上说开释他。”^{[10]215}

由此可见,李光地是从杨道声处得知陈梦雷如何面见康熙帝的情形。在表述上,杨转述陈面见康熙帝的情形时,强调陈并没有在康熙帝前说李光地的坏话,让李放心;给李说话时,又站在李的角度,说陈“要迫得”李自认罪,向皇上说情来开释他,讲话非常讲究分寸,让陈、李双方都觉得杨是可信赖、可交往之人,在客观上对李、陈关系起到了很好的调和作用。

正当二人联璧王府,共纂图书时,不料杨却因病而卒,陈悲痛异常,连作《代诸护卫祭杨道声文》《又代诸护卫祭杨道声文》《同李铭原祭杨道声文》三文以祭祀。杨去世后,其子祖祥仍然得到陈的关照。古今图书集成馆成立后,杨祖祥被聘入馆修书,直至雍正帝即位后,陈全家再遭贬谪,被发遣至黑龙江卜魁,杨祖祥也被牵连而遭“奏明驱遣”^[15]。

六、结 语

综上,陈、杨之交,为生死患难之交,知己之交,既能同危难,也能共富贵。杨文言救陈梦雷于生死之际,陈梦雷亦能报恩于得意之时,其

情可嘉。二人学问各有专长,出处有所不同,追求并不一致。陈梦雷弱冠举进士,自始至终怀有强烈的尽忠报效清朝的思想,有强烈的事功意识。杨文言祖父在明代为高官,父杨瑀明亡后不仕清,以讲学、著书终老。受其影响,文言与其兄昌言皆未参加科举考试,对清王朝有所排斥,但也知道复明无望,故只想做隐士,无奈生计逼迫,不得不外出谋生,遂遭遇耿氏之乱,招致污点。随着康熙朝战乱的平复、政治的稳定和文化的繁荣,杨的思想也有所转变,但其曾为耿精忠门下人的这张标签使他很难被举荐,所以只能为熟人如徐乾学、李光地、余国柱等所聘用,为人捉刀,“然行李往来,犹变姓名,类于逃亡张俭”^{[12]434}。直至进入允祉王府后,方能光明正大地参与修书。作为一介布衣,能够依托诚王府,生活无忧,学术能力得到最大发挥,人生价值得以部分实现,不失为一种最好的选择。而这一切,与陈的极力引荐和不断鼓励密不可分。从耿精忠叛乱闽中相识相知,到乱后杨助陈脱困,再到陈梦雷贬谪沈阳时书信往来,互相勉励,最后到陈梦雷担任允祉侍从后荐举杨氏入幕,联璧共纂书籍,陈、杨之交,真可谓患难与共,互促互助,至诚至真,可歌可泣!

[参考文献]

- [1] 顾炎武. 与杨雪臣[M]//顾亭林诗文集亭林文集:卷六. 北京:中华书局,1983:139.
- [2] 庄毓铨. 武阳志余:卷七之二[Z]. 清光绪十四年,活字本,1888:46-47.
- [3] 陈梦雷. 松鹤山房文集[M]//清代诗文集汇编:第179册.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 [4] 江日升. 台湾外志:卷一六[M]. 吴德铎,标校.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255.
- [5] 杨文言. 南兰纪事诗钞[Z]//杨宝彝. 大亭山馆丛书,光绪阳湖杨宝彝刻本.
- [6] 李清馥. 榕村谱录合考:卷上[M]//李光地. 榕村全书:第10册.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3:182.
- [7] 邓之诚. 陈梦雷与李光地绝交[M]//骨董琐记:卷八. 北京:中国书店,1991:253.
- [8] 陈梦雷. 松鹤山房诗集[M]//清代诗文集汇编:第179册.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 [9] 陈梦雷. 闲止书堂集钞:卷二[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146.
- [10] 李光地. 本朝时事[M]//榕村全书:第7册.

-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13.
- [11] 永瑢, 纪昀, 陆锡熊, 等. 四库全书总目: 经部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5: 39.
- [12] 邓之诚. 清诗纪事初编上: 卷四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2.
- [13] 杨文言. 南兰纪事诗 [Z]. 清康熙杨祖祥刻本.
- [14] 阙名. 圣祖仁皇帝实录: 三 [M] //清实录: 第 6 册.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76.
- [15] 允禄. 世宗宪皇帝上谕内阁: 卷二 [M] //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第 414 册.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 31.

An Exploration of the Friendship between Chen Menglei and Yang Wenyan

ZHANG Xiaohong, GAO Wenqing

(School of Marine Culture and Law, Jimei University, Xiamen 361021, China)

Abstract: Chen Menglei was a famous scholar of the Qing Dynasty and the compiler of *The Ancient and Modern Books Collection*. His life was marked by the “Three-Clan Rebellion”: He was relegated to Shenyang for seventeen years, returned to the capital after being pardoned and served as a retainer for the third son of Emperor Kangxi, Yunzhi, for nineteen years, and then relegated to Bukui in Heilongjiang when Yongzheng came into power. His longest and most affectionate friend in life was Yang Wenyan. They met in the period of Geng Jingzhong’s rebellion in Fujian; after the rebellion, Yang helped Chen manage to get out of trouble; during Chen’s relegation to Shenyang, they exchanged letters and encouraged each other; after Chen served as Yunzhi’s retainer, he recommended Yang to join his staff and compiled books with him. They shared their difficulties and helped each other to write a song of friendship.

Key words: Chen Menglei; Yang Wenyan; Li Guangdi; exploration of the friendship

(责任编辑 陈蒙腰)

(上接第 56 页)

China’s Human Capital Accumulation and Export Commodity Structure Upgrade

ZENG Weifeng, ZHANG Yixue

(Finance and Economics College, Jimei University, Xiamen 361021,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change of factor endowment, the traditional dynamic transformation theory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 explains, main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abor-capital relative price rise, the technological choice of enterprises and the resulting shift of export commodity structure from labor-intensive industries to capital-technology-intensive industries. Based on the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of college enrollment expansion in China,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triple difference model (Difference in Difference in Difference) and makes an empirical analysis. It shows that human capital accumulation significantly promotes the upgrading of export commodity structure through expanding the utilization of foreign capital investment and advancing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Regional heterogeneity indicates that human capital accumulation significantly promotes the capital intensity of export commodities in eastern China, but has no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Industry heterogeneity indicates that human capital accumulation significantly promotes the capital intensity of capital-technology-intensive export products, but has no significant impact on natural resources and labor-intensive export products. This paper provides a new explanation for the upgrading mechanism of export commodity struc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uman capital accumulation.

Key words: human capital; export commodity structure; college enrollment expansion; Difference in Difference in Difference

(责任编辑 张永汀)